

宋刻珍本《禹贡论》《山川地理图》 及其作者程大昌简论

丁 瑜

《禹贡》是儒家经典《尚书》中的一篇，它以自然分区方法，记述了我国古代地理状况。内容分全国为九州，是我国最早具有高度科学价值的地理著作。《禹贡》文字简古深奥，后世注解阐述之作很多。宋程大昌的《禹贡论》和《山川地理图》，即是系统论述《禹贡》的代表作之一。此书初刻原印宋本，现藏北京图书馆，是研究我国古代地理学史的珍贵文献。

程大昌徽州休宁人，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（公元1151）进士。孝宗乾道间官著作佐郎，慷慨有大略，对边防军政、农田水利颇多研究。南宋初，宋金两朝对峙。宋沿淮河多筑城堡，而疏于练兵。大昌上书孝宗提出：“设险莫若练卒，练卒莫若择将”的战略主张，深得孝宗赞同，除浙东提点刑狱。大昌为人劲直，不事迎合，因得罪权贵，徙江西转运副使。宋朝转运使有掌握财赋，及督察地方官吏之权，是直接影响人民切身利益的地方长官。大昌接任后，自谓：“可以兴利去害，行吾志矣！”对官阶的升降，从不介意。是时，其所辖清江护田堤堰圯坏多年，岁罹水患，官守不加修治，乡民困苦。大昌莅任，修堤治堰，水患尽除，乡民称庆。事闻于朝，进秘阁修撰，召为秘书少监兼中书舍人。适遇临安六和塔寺僧人，托言修塔镇潮有功，求赐赏银并豁

免庙田科徭。大昌上书力驳其妄，奏称“僧寺既违法置田，又移科徭于民，奈何许之？况自修塔之后，潮果不啮岸乎？”在大昌力争之下，赏赐僧人之议遂罢。

大昌学识渊博，实践经验丰富，对古今史事无不考究，著述很多，行于后世之作有：《易原》八卷，《雍录》十卷，《考古编》十卷，《演繁露》十六卷续六卷，《北边备对》一卷。此《禹贡论·图》又其精心之作。孝宗淳熙四年（公元1177），大昌以侍讲之职，在禁中讲授《尚书》，写成《禹贡论》五十八篇，《后论》八篇，绘制《山川地理图》三十一幅，每图前均撰“叙说”一篇，《论》、《图》共计五卷上表进呈。孝宗称其精博，诏付秘书省度藏，以垂后世。

《禹贡论》成书之后，藏于秘阁，民间迄无传本。淳熙七年（公元1180），程大昌以敷文阁学士出守泉州，泉州市舶彭椿年从大昌得此书与《山川地理图》副本，嘱州学教授陈应行刻于郡庠，始有刻本行世。北京图书馆收藏宋本即此初刻宋印原本。《山川地理图》原稿使用彩色绘成，以青色为水，黄色为河，红色为古今州道郡县疆界。刻版印书时，由于雕版印刷技术未精，不能使用套色印刷术刷印，乃以黑色为水，双黑线为河，以单黑线为郡县疆界。这部地图册虽非彩色套印，但已是世界上最早有确实刊印年代的第一部印刷地图册^①。不仅是研究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，也是研究印刷史，版画史，科技史的珍贵实物资料。

此书正文每半叶十二行二十二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，板框高19.1厘米，广13.1厘米。版心下有龚遂、陈禾、叶志、张才等刻工姓名。刻字隽美，纸墨精莹，洵为宋刻本中之杰作。书末有淳熙八年（公元1181）陈应行刻书跋文曰：“阁学尚书程公，曩在经筵进黑水之说，上动天听，因以《禹贡》为论、为图，启沃帝心。其本藏之秘馆，天下学者欲见而不可得。岁在庚子，公以法从出守温陵，而编修彭公提舶于此，与公有同舍之旧，得其副本。

应行因再拜以请，而三复其说。见其议论宏博，引证详明，皆先儒之所未及，乃请于公愿刊之郡庠，以与学者共之。”从陈应行跋文可见当时孝宗赵慎以及官员学者，对此书评价之高。清乾隆间编撰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亦称誉此书“援据厘订，实为博洽，至今注《禹贡》者，终不能废其书也”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十一，著录有《禹贡论五卷、后论一卷、山川地理图二卷》。其所著录之卷数实误。按现存历代书目著录此书最早者，为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，该目记载：

“禹贡论二卷、图二卷，程大昌撰。凡论五十二篇，后论八篇，图三十一。其于江、河、淮、汉、济、黑、弱水七大川，以为旧传失实，皆辨证之。”宋本彭椿年序称：“辨证经旨者，著之于论，论凡五十有二；论尝指事说理，而当证以山川实地者，则为之图，图三十有一；至其事不隶虞夏，而源流本出此经者，则又为后论八篇。”查宋本目录及内容篇章与序正合，与陈直斋《解題》所列之内容篇数亦合。可知程氏此书卷数确为《论》二卷、《后论》一卷、《图》二卷。经查《文津阁四库全书》本《禹贡论》内容亦为上、下二卷，不是五卷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及《宋史·艺文志》等书目之所以著录为五卷，乃在于原书《论》、《图》均各分为上、下二卷，《后论》八篇自成一册，全书均未曾以数目字标示卷数，后人未察其详，故有不同卷数之著录也。

此宋刻本没有后人的批校题跋，纸墨如新，书中藏书印章有近人乌程蒋祖诒和祁阳陈澄中两家印鉴。此外，时代较早者惟见清代郁松年藏印。郁松年字万枝，号泰丰，上海人，道光二十五年（公元1845）恩贡生。好读书，藏书十数万卷，多宋元旧本。陈奂《师友渊源记》称其：“饶于财，凡宋人典籍，有未刻或刻而板废者，不惜重资以置邨架。刊有《宜稼堂丛书》。”此宋本虽经郁松年收藏，但其所刻《宜稼堂丛书》却未见收录，更见其稀罕珍贵。此书非但宋本传世孤罕，其它刻本也不多见，后世翻

刻或抄录全书者，惟见康熙间纳兰性德所刻之《通志堂经解》本，以及乾隆间手写之《四库全书》本最为完备。但《经解》本仅刻前、后《论》和《图》之“叙说”文字，未刻《地理全图》。《四库》本乃据明代《永乐大典》^②抄录，《论》、《图》俱备，惟缺《九州山川实总图》及《禹河汉河对出图》二幅，故亦不得称为全本。至若内容亦多有与宋本不同者。如宋本“宏抚”，《经解》本作“宅抚”；宋本“既己为九”，《经解》本作“故播为九”；宋本“汉世”，《经解》本作“河世”等约百余处。两者相校，瑕瑜自见。

此宋刊本是北京图书馆于建国初期，收集的孤本秘籍之一，近期中华书局根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小组的规划，已将之影印，辑入《古逸丛书》三编中，以广流通，供研究古籍者之参考。

注：①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组编《中国古代地理学史》，及英国李约瑟著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第五卷，均认为“杨甲在公元1155年（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）前后编绘的《六经图》是我国的第一幅印刷地图。而欧洲的第一幅印刷地图（布兰迪斯所制木刻图），较它晚二百年左右。”按《六经图》现存南宋福建刻本残卷，并无刻书确切的具体年代。作者杨甲是宋孝宗乾道间进士，程大昌乃宋高宗绍兴间进士。程中进士早于杨二十年左右，以二人科第先后，可以推断杨甲刻《六经图》之年，当不会早于程大昌刻《禹贡山川地理图》之年代。

②《永乐大典》原本已佚。

